

淮海战役后蒋粤桂的矛盾及其 最后在广东垮台

梁世驥

(一)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被解放大军消灭殆尽，国民党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又乘机利用和谈的伪善面孔，企图迫蒋去职，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蒋在这内外形势压迫之下，不得不退到幕后操纵。一方面暂时容忍李宗仁出来以“代总统”名义和中共周旋应付；另一方面对于军事、政治各方面作全面调整部署加紧控制，企图作最后挣扎。对广东认为是华南一个重要地区，决不能放手。但是又不能叫宋子文再呆下去，以免各方面有所指摘，最好的办法还是假广东人之手来统治广东。因此，蒋就叫宋辞去广东绥靖主任和省政府主席各职。并把绥靖主任让给余汉谋，省主席让给薛岳。蒋把宋原来集于一身的广东军政大权分成两部分给余、薛。用意是为了多拉拢一些人，更是为了分而治之，使余、薛二人互相牵制。

李宗仁上台第一个任命状就是发给了张发奎，叫他接替余汉谋任陆军总司令，这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张发奎拉拢广东，造成两广联合局面，作为最后与中共讨价的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酬谢张在伪国大选举时采取“拥孙（科）拉李”的好意。

余汉謀为什么能够于此时此地广东担当一条比較重要的台柱呢？主要原因是：1.余对后調广东整补編練的部队有历史渊源，部队长中除容有略（64軍軍长）是旧四軍系外，其余如154师（溫淑海），62軍（张光琼），63軍（刘栋材）等，都是余汉謀的旧属。这些軍队都是被打残后調回重新整編的，有一些实力，是余的政治本錢。2.余汉謀自1936年倒陈（济棠）投靠“中央”之后，和蔣帮里的一些大头目很有关系。余的妻子是上官云相之妹，和汪醒吾（抗战时第七战区參謀处长）是联襟之亲，上官和汪都是接近何应欽的人物，因此，余汉謀也就接近了何系。而当时蔣王朝中，是何系当权。說明余取得这一席位，有一定的派系关連。3.余这个人，貌似愚忠，內藏机詐，肆应各方，极其圓滑。就在这种“扮猪吃老虎”的姿态下，取得各方面的奥援，获得了广东綏署主任一职，企图苟延残喘，以观时局演变。

談到薛岳，他是陈誠一系，既有野心而又是坚决反共的死硬派人物，蔣介石为了給余汉謀独揽广东軍政大权，就安排了薛岳（原是伪总統府參軍长）来接省主席。他过去在九战区时，是声势煊赫，有駕凌七战区余汉謀的趋势，现在要在余汉謀綏靖主任指导下来掌民政，內心有所不甘，可是那时的情势，舍此又无所凭借。而余汉謀在內外夹击——蔣的控制和解放大軍渡江的声势迫人之下，亦觉得多一个陈誠系的人来主政，对于爭取台湾陈誠支援，苟延残喘亦有所帮助。所以当薛岳在乐昌原籍扭妮作态时，余汉謀即派員（黄范一等）到乐昌劝駕，（听说台湾陈誠亦电促薛岳就职），他便欣然来省就职了。余、薛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标榜了“广东大团結”，但彼此間仍存猜疑和存在一定的矛盾。如当兴宁、龙川地区举起义旗投靠人民时，薛岳一日中連打二、三次电话問当

时的綏署參謀長梁世驥：“余主任对兴、龙事变态度怎样？有什么措施？”言外之意对余汉謀显然有所怀疑和指責。

至张发奎是既反蔣又反共的人物，他有很大野心，对陆总觉得是空头的，自己没有实力，所以迟迟沒有接受任命。同时张发奎与余汉謀間，过去有一定的嫌隙。（1938年广州失陷，余汉謀退守粵北时，张发奎以四战区代长官資格，在翁源三华十二集总部軍师长會議上大肆指摘余汉謀所部不战而逃，有失粵軍第一师的光荣传统，是广东軍人的奇耻大辱。大有迫取余汉謀而代之之势。）薛、张虽同是旧四軍人員，但过去在抗战时，对于旧四軍的旧属使用，亦存在一些芥蒂。现在彼此要来合作，心中总有一些疙瘩。不过余、薛二人既标榜“广东大团结”，以便盘据广东来对中共討价，当然不能沒有张的一份。为了联合广西的李、白，更少不了张这一角色。反正軍政实权在手，不怕张拿得去，于是极力劝张就陆总职，并表示奉张为“大哥”，愿意凡事与他商量。张原有意以李宗仁为后台，以余、薛实力为本錢，以两广为基地去反蔣抗共，自打天下的。經余、薛二人这一劝駕，奉为“大哥”，就馬上就任陆总。张发奎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有一次他在其私宅里和梁世驥談时局問題，他說：“广东人應該大联合。蔣家天下，原是广东人打出来的，后来广东人何以这样失敗？就是因为自己不能团结，鬼打鬼，两广事变，粵桂問題等就是不团结鬧出来的。现在應該粵桂大团结，維持两广局面，就可以对中共討价还价。”他并要梁世驥把这番意见和余汉謀談一談。自然，余、薛对这点是有共同理解的。所以，尽管余、薛、张三人各有图謀，但終因反共反人民的目的相同而暂时“合作”了。

(二)

1949年初，解放大軍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华中、华南，华南各地都在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事前，梁世驥到香港，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决定利用自己与余等的旧关系，到余汉謀集团里去，策动余汉謀反正或設法保全广东和广州，以迎接解放。依据当时的态势，梁世驥經其保定軍校同学张达（綏署副主任）向余汉謀的推荐，欧阳駒（广州市长）向顧祝同（伪中央參謀总长）的說項，就由伪中央派他为綏署參謀长。

解放大軍渡江之后，不久长沙起义，李白的桂系部队已退到衡阳一綫。在这一連串的崩潰情况之前，余汉謀除拼命补充兵員，充实装备外，为了維護他的統治，除63軍刘栋材部仍在肇庆罗定附近整补，并陸續将张光琼的62軍移駐湛江地区，容有略的64軍移駐海南，广州附近只有溫淑海的154师和綏署的警卫团以及刘安琪的50軍（缺一师，是蔣的嫡系部队，由青島撤回的，他另外的32軍和50軍的一师以及二个独立旅已直运海南）。薛岳亦将原来的十二个保安团扩充为十六个团，編为四个保安师，主力控制在广九沿綫和惠阳一带，其余分別駐守潮梅和粵北地区。为什么余、薛会将兵力这样分散，特别是余汉謀会将他的比較可靠的部队如张光琼軍分散到湛江地区呢？除了当时要压制中共的地下武装維持他的統治外，主要在討論广东的防守計劃时，估計在解放大軍压境之下，不能不采取重点防禦，以广州外围白坭、花县一带为第一防綫，广州近郊白云山、观音山一带，为第二防綫，嬰城固守待援，万不得已时則退至潮汕一带再行打算。但又怕被解放大軍由河源截击，全軍潰散，故决定退去湛

江，以海南島为基地，雷州半島为外围，喘息待援。

大約是1949年8月間（時間可能有出入）白崇禧所統率的桂軍，（主力张淦兵团計有四个軍）已在衡阳一带被解放大軍压迫面临崩潰的前夕，听说李宗仁（当时李早已經由张发奎劝駕由桂林到广州）主张桂軍退守广西，以广西为抗共基地，連結西南地区作垂死掙扎。但张发奎等主张以广东为基地，說广东富庶，有出海口，外援容易，条件优于广西，白崇禧乃于八月的下旬由衡阳来广州商議，作最后的决定。在李白和张、薛、余等人商議决策之后，白崇禧并特到綏署来（现在省人民委员会大楼）召开會議，作細节的安排，参加人員有余汉謀、张达、梁世驥、张宗良（副參謀长）和各处处长等。

那时江西方面吉安已經解放，大軍到了贛州附近。判断大軍可能从贛州出和平、龙川下东江，另一路出南雄、始兴打粵北；因此，防守方案，决定采取决战防御：桂軍以有力的一部防守乐昌北九峰山、仁化一带山地，掩护翼側，主力控制在韶、始一带；抽調刘安琪在海南島的主力（32軍及二个独立旅）合并原在广州的50軍进出翁源坝子之綫；由江西进入梅、蕉一带的胡璉兵团，以主力收复兴宁、龙川一带地区后，即进入和平附近，拒止解放大軍的南下；葛先材师（属邓春华109軍）仍在河源附近巩固后防，并将在潮汕附近喻英奇的零星部队編成一师，待胡璉兵团的一部接防后，即船运广州，連同在博罗附近的154师控制为預备队。这一方案的唯一意图，是对解放大軍进入粵北山地隘路兵力分散时，粵桂两軍即乘机进击。但当計劃决定后，桂軍前头一軍，已到达乐昌附近，前头部队且进至了犁步头时，刘安琪却不听調度，迟迟不动。原因是蔣介石要保持实力，不欲刘軍参

战，同时希望搞垮了两广地盘，也就搞垮了李宗仁的代总统，于己有利。因此，叫一直由他控制的国防部出来阻挠，示意刘按兵不动，因此，已进入乐昌的桂军见此情景，遂调回衡阳，不久溃退广西，从此粤桂分手，大联合的梦做不成了。

粤桂联合防守粤北这第一个方案已经破灭，于是想执行原定守花县一綫的内綫作战方案，但亦由于刘安琪的50军迟迟不作准备，当解放大军进至英、翁时，他只派一个团敷衍一下，所以第二案的内綫作战亦放弃了。此时他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道路，只有撤出广州。就这样，解放大军兵不血刃而解放广州，使人民免受反动部队抢掠焚杀的浩劫。下面是他们撤退前后的情况。

当南京政府南撤广州，取消叶肇的广州警备司令，由李及兰改组成为广州卫戍总司令部时，国防部曾由台湾调爆炸队到广州，准备撤退时炸毁粤汉铁路沿綫桥梁和广州附近一些重要建筑，广州近郊防御工事亦由南京政府拨款并规划包由承商构筑永久或半永久工事，因綏署与卫戍总部对承商的包揽分赃相持不下，结果只草草构筑一些野战工事。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广州卫戍总司令部亦纷纷假借名义，分别招集流氓地痞成立所谓自卫队、别动队、谍查队等到处横行霸道，鱼肉商民，但广州解放出乎意外的迅速，斩断了他们的魔爪。广州的撤退行动是10月12日晚（距离广州解放前两天）参谋总长顾祝同在广州东山保安后街余汉谋公馆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决定的，这次会议只谈了个多钟头，顾要撤退，余汉谋无表示，自然也是赞成撤退的。最后顾祝同宣布决定马上撤出广州，分两路退过海南岛，以海南岛为基地，守住雷州半岛。顾次日坐飞机溜去了台湾，綏署除根据上述

决定下达撤退计划外，并将經前此三次遣散之后剩下的人员和物资，于当晚天亮前开始装載在事先雇好的海輪，十三号午前先后启航，开至虎門。这时在博罗的154师师长溫淑海逃走了，由副师长郑蔭桐率領起义。要退过湛江的刘安琪部队和由江西贛州潰退下来的某部队（番号和部队长姓名均忘記）被迅速由四会直趋下来的解放大軍截住，过不了雷州半島，由蔣介石派运输舰在阳江附近的開坡漁港上船撤走，喻英奇和刘栋材等部先后在廉江附近全部被俘虏。跟着在湛江的62軍又有一部分起义，因此守駐雷州半島也成了空話，余汉謀和綏署一些职员从虎門坐海輪到湛江轉去海口。

余汉謀从粵北撤退，花县撤退，到广州撤退，直縮过海南，始終一枪不发，既不起义，不投降，也全不抵抗，一味逃走。这里面大約有几种主要原因：第一、兵少，根本談不上打；第二、受各地人民武装牵制，要分些兵力去“鎮压”；第三、部队内部不稳，大家为了自己出路，紛紛酝酿起义；第四、各方面矛盾重重，互相牵制（特别是余蔣之間，李蔣之間，余薛之間的矛盾等等）經過梁世驥屡次劝他“你在抗日时期丢了大广州，广东人民都罵你，现在，你不应在此临去时候再得罪广东人民了。广东是我們家乡，那是不能让它糜烂的。我們干干净净地走，或許可以留一些余步为老百姓所諒解。”同时余自反陈以后，投靠“中央”，个人也相当一帆风顺地做了許多年大官，发了大財，个人腰包重了，做个海外寓公也可以过得一世。所以有人叫他起义，他叹息着說：“做到这步（指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他是想自己把担子一滑，一走了之。所以他到海南时，自动請求取消了“广东綏靖主任公署”这个机构，并在广州时自己掏腰包发遣散費三个月薪水，把綏署大部分职员分三批先期遣散。余

取消了綏靖主任銜頭之后，又怕人說他逃跑，所以表示愿在海南島做陈济棠的副手，当一名空头的警备副司令。

当余汉謀等一伙人决定退过了海南島时，有关方面要我也跟着过去，但眼看海南不久即可解放，对余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期望，1949年底，我离开海口过香港轉返广州。临行前的一晚，在海口俱乐部，大家飲酒，还打小麻将，余汉謀无表情。张达趁着酒意，大罵蔣介石，說蔣太过自私，排斥异己，现在使我們死无葬身之地。张罵罢痛哭起来，余汉謀已先悄悄退席了。反动派就是这样反动到底，死硬到底，他們既在矛盾中生存并夺取地位，最后必然又在矛盾中复灭。

国民党崩潰时期 桂系与蔣介石的傾軋

關宗驊

一、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内幕

李宗仁于1945年日寇投降后，任北平行营主任。当时美帝駐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亦駐北平。李为討好美帝，派其心腹謀士甘介侯（留美学生，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与司徒雷登密切勾結，由司徒雷登轉介于美帝駐中国特使馬歇尔。馬歇尔認定李宗仁是美帝最理想的馴服走狗，准备加以豢养。1947年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李宗仁准备竞选副总统，甘介侯代李拟訂竞选副总统的政见，大意是：（1）国民党内取消派系；（2）取締孔祥熙、宋子文的官僚資本；（3）改革币制；（4）取消政治独裁；（5）实行中央与地方均权制度。李提出这几項政见，用以欺騙国人，因而得到大部分对蔣不滿的国大代表的支持。1948年4月伪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蔣介石大力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派人四出为孙拉选票，用尽威胁手段。另一方面压制李宗仁不要竞选。蔣介石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卑劣手段呢？他一向惧怕的是两广团結，如果两广团結，对他的統治是极其不利的，他感到要破坏两广团結，就要对李竞选采压制手段。李宗仁也不示弱，利用桂系李品仙（安徽省主席）和黄旭初（广西省主席）在安徽广西两省搜

括民脂民膏得来的脏款进行贿选。李和其妻郭德洁不惜亲到各代表处暗许贿款，暗许官职，而且每天设盛宴招待他们。当到了最后关头时，蒋亲自出面以电话与李直接通话，威胁李停止竞选，否则将有不利。李乃日夜痛哭，精神失常，语无伦次。最后由司徒雷登出面斥蒋，蒋不得已才放弃压制手段。李宗仁遂当选副总统。自李当选后，蒋迁怒于白崇禧支持李竞选，将白所任国防部长免职。1948年6月我到南京住在白的家里，他的老婆马佩璋哭丧着脸对我说：“德公（李宗仁别号德邻）就好运气咯，健生（白的别号）就倒霉了。”

二、李（宗仁）、白（崇禧）伪装和平的用心

1948年秋蒋鉴于时势危岌，弃瑕任用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赴汉口就职，同时并调桂系驻皖鄂一带部队集中武汉外围布防，准备抗拒人民解放军。1948年10月当时蒋将大批军火准备运往四川，经过武汉时为白扣留，用此批军火装备桂军，蒋大为不满。又当淮海战役紧急，黄百韬、邱清泉、黄维等几个兵团正被解放军围困待援，蒋急调宋希濂兵团由鄂前往淮海增援，又为白阻挠。白认为蒋指挥失当，宋兵团增援已来不及，无救于淮海战役的失败，留宋兵团在湖北，可以厚集兵力以对付南下的解放军。蒋大为震怒，认为白此举是拆他的台。

淮海战役徐州已被包围，1948年12月间白崇禧一面放出伪装和平空气，自武汉和我通长途电话，叫我请民主人士何遂先生去武汉，并嘱我往见广东省议会议长林翼中和广州市议会议长陆幼刚，征求他们对和平的意见，请他们发电主张和平。林、陆对我说，必须征得宋子文（广东省政府主席）同意，不敢表示意见。不久，白又用长途电话告诉我，湖

北、河南、广西三省省議會已发出主和通电，嘱我再与林陆商談，請他們发出响应和平通电，林、陆仍不同意。

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发出主张和平，迫蔣下野的电报，蔣介石派张群到武汉疏通，亦无結果。又过了一个时期，白用电话通知我說，黄季宽（黄紹竑別号）往广州去香港，叫我到机场迎接，不久又嘱我送港币七万元交黄季宽应用，另又派一个电务員到香港給黄使用。并說，已派刘仲容与南下解放軍商洽停止軍事行动，武汉可能无事。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白又給我电话，嘱我到香港催請黄季宽去汉口，他对我說，將請黄作为前往北京商談和平的代表。

由于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当时央請张治中、邵力子、黄紹竑、刘斐等八人組織和平代表团到北京，以毛主席发表的八条和平条款为基础进行商談。李、白阴谋利用和平談判阻止人民解放軍南下，以保存国民党残余軍隊，作卷土重来的梦想；另一方面，由白踞守武汉，阻击人民解放軍，同时李、白派甘介侯和一个姓馬的到日本去见美酋麦克阿瑟（美国占領日本的統帥）及远东舰队司令白吉尔要求接济现代装备，以装备桂軍。馬某于1949年5、6月間从日本回到广州与夏威（当时的华中軍政副长官，即“剿总”改換的名称，由白任长官），同住广州爱群酒店。我当时去看夏威，馬某亦在座和我談話，夸耀他这次任务圓滿完成归来。甘介侯由日本回到广州謁见李宗仁后，李再派他到美国找司徒雷登（李接任代总统时，司徒雷登答允接济李、白巨額美金），請求美元接济。李嘱中央銀行支給甘赴美費用五万美元，該行拒絕，后經調停，方允支給。等到黄紹竑带回和平条款到南京，李白拒絕接受。白曾对我

說，这次和平談判，海竟强（白的胞姐的儿子）甘成城（夏威的外甥），（这两人曾任国民党46軍师长，1947年在山东省胶济路作战被解放軍俘虏）两人获得释回，已达到談判的目的。

三、桂系企图割踞湘、粵、桂翼隅頑抗

李宗仁之代理總統，据蔣宣布是交由李代理，而李却自称是继任，彼此曾一度爭吵不休。1949年4月李畏惧蔣系軍警在南京对他不利，乘飞机到广州观看风头。当时蔣已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謀为广东綏靖主任，陈济棠为海南行政长官。李到广州的目的是企图拉攏薛、余，以为己用，住在中华北路（现解放北路）迎宾馆。余汉謀与李敷衍周旋，薛则态度冷淡。李感觉风色不对。恰好张发奎此时亦在广州，李为拉攏薛、余，請张屈任国防部陸軍总司令，张亦表示愿为效力。李即飞回桂林，在桂召开广西高級党、政、軍人員會議，报告迫蔣下野經過，并伪装向他們征求和平与战争的意见，以观各人对己的向背。与会人員面面相覷，表示绝对服从。只有李任仁（国民党中央委員和上届广西省參議會議长）发言主张接受中共和平条款。李大不高兴，旋李任仁即潜赴香港。

此时白崇禧由武汉发电到广州征求我出任財政部次长（当时何应欽任行政院长，徐堪任財政部长），我复电力辞。白接电后又叫他的亲信秘书杨受琮給我电报說“財次，部座仍属意于公，幸勿固辞，部座日內飞粵，与公面談。”1949年4、5月間伪国府部院头子，由南京陸續逃到广州，一部分迁来办公，一部分逃到重庆。白此时亦到了广州，我到机场迎接。他叫我同乘汽車到他的妻弟馬仲孚家里。（广州农

林上路，白的老婆亦住在那里）来宾走后，邀我到寝室长谈。他说，人民解放军已渡江，南京即将失守，武汉四战之地，除桂系军队外，其他各部很不可靠。而程頌云（即程潜，湖南綏靖主任）陈明仁（湖南省政府主席）又态度暧昧，我准备把他们干掉以便据有湘、粤、桂三省和共产党讨价还价。把这三省作为我们的地盘。云南卢汉，贵州谷正伦，四川王纘緒、王陵基、邓錫侯、刘文輝、潘文华等必不至于投共，可倚为声援。广东方面余幄奇（余汉謀别号）可引为我们用，只有薛伯陵（薛岳别号）与薛修（陈誠别号）关系最深，薛修是我的政敌，恐怕薛不愿与我们合作，将设法与陈伯南对调。这样做，湘、粤两省就落于我们的掌握了。国府现在迁来广州，行政院即将改组。我们过去曾经掌握过中央政权，惟因没有注意掌握财政金融机关，以致失败，现在我们迫蒋下野后，德公继任总统，掌握了中央。居觉生（居正别号）与我们的关系很接近，将来行政院长一职，将通过立法院选居正任行政院长，我们都属意你暂任财政部次长，你与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有些交情，也可能推荐你兼中央银行副总裁，这事关系我们的命脉，不能失此机会。白又对我说，他的看法，美国与苏联的战事，即将爆发，第三次大战快要到来，只要我们守得住湘、粤、桂三省，甘介侯到日本和美国已得到对方答应大力援助，现代装备和美元即将运到，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听了他说完这番话后，借故推宕。即到香港见黄紹竑，请他写信给白，仍劝他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这信由我带回广州呈白，白阅后转交给我看，他问我的意见，我答复他，季公的意见也很有道理。白愤然作色说：“岂有此理”。

不久，行政院改组我不愿就财次。白回武汉以长途电话

邀我任华中軍政长官部經濟委员会主任委員，我亦固辞，我此时正进行香港广西銀行董事长，欲得此职，以观时变，因李宗仁不同意而止。

1949年8月刘斐（和平代表，抗日期間任国民党政府軍令部次长）由北京到广州，仍劝李、白接受和平条款，李、白为实现割据湖南省的阴谋，准备利用刘斐回湘接替陈明仁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同时也获得程潜、陈明仁的电复同意。刘到广州之翌日，即乘飞机往香港，以避李、白的糾纏。李派总统府秘书长丘昌渭持李、白致刘长函赴香港劝駕，刘不为所动。

由于桂系要实现割据湘、粤、桂三省的目的，湖南方面，白用重兵准备迫走程潜，陈明仁，踞而有之。对广东方面，先派黄旭初来粤与粤当局联系，按照宋子文主粤时，广西压价收购土特产和粮食运粤交粤局高价出售，以充实广东的軍政費。又利用张发奎为薛岳的老上司，且为粤系老前輩，由张拉攏薛岳，仍以为力量未足。当行政院改組时又推李汉魂任內政部长，使李进一步改善薛与桂系的关系。达到张，余，薛意见一致，共同认为过去两广合作，取得胜利，两广分裂，予蔣介石各个击破的机会。广东軍事方面，由李、白派苏祖馨的四十八軍入粤助守，归张发奎指揮。誰知好梦未圓，人民解放軍已进迫武汉，白仓卒下令桂軍全部撤退，他准备經過长沙时，阴谋扣留程、陈两人，程陈率部退走宝庆。广东方面，又为蔣介石先派胡璉两个軍进驻，桂軍一个軍未到韶关，即自动撤回湖南，退至祁阳为解放軍追击，被四面包围，突围而走，損失甚大。李、白割据湘、粤、桂三省的幻梦，尽成泡影。白在武汉撤退前，尽将武汉官僚資本的布厂、紗厂的棉布，棉紗劫走，交其亲信唐紀和

其妻弟馬仲孚售賣，所得价款數百萬銀元，盡入白、唐、馬三人私囊。

四、行政院長之爭

1949年4、5月間南京政府各部院頭子紛紛逃來廣州，只有各部院次要以下各級人員逃往重慶。李宗仁於同年五月間回桂林後，為爭總統代理和繼任問題與蔣大鬧別扭，不再來廣州。蔣則乘此機會到廣州布置軍事、政治，作最後困獸掙扎。白崇禧此時正在廣州，乃親謁蔣請罪，蔣亦無可奈何。蔣布置行政院院長的改選後，又飛往重慶、成都布置軍事，妄圖卷土重來。當時李避居桂林，廣州群蛇無首，乃推居正和閻錫山乘飛機赴桂林迎李來廣州。李到廣州後，何應欽力辭行政院院長，醞釀繼任人選時桂系屬意居正，蔣則屬意閻錫山，蔣和桂系雙方大力拉攏立法委員，成勢均力敵之勢，但因蔣先已布置一著，而桂系一部分立委中可能拉選票的人物，如韋永成等為了顧全身家，走往香港，結果閻錫山比居正多了幾票，當選為院長，桂系大失所望，李宗仁把韋永成叫到總統府大罵一頓了事。

自閻錫山任行政院院長後，除內政部部长李漢魂，為桂系推薦者外，其他各部長，俱為蔣系人物，府院之間，時生齟齬，偽總統命令不出府門一步。

五、桂系的最后复灭

李宗仁到廣州後，蔣已飛赴重慶、成都布置軍事。因李對川、滇、黔亦有野心，當人民解放軍1949年10月初進展到達江西、湖南時，廣東省內游擊隊紛紛出動，國民黨軍隊相繼起義，李觀此情況，即飛赴重慶，企圖相機拉攏四川、云

南、貴州軍閥反蔣拒共，妄想保有西、南。当时蔣在成都，李不敢前往。他認為龙云是他的兰譜兄弟，卢汉为龙的亲信，乃毅然前往昆明会晤卢汉，企图与卢合作，并为桂軍作退步計劃，遭卢拒絕。由于解放軍已进入广西境界，桂軍瀕于崩潰，李不得已，才由重庆飞往香港，轉逃美国。

广东方面，张发奎、余汉謀、薛岳原想联結桂系，以保广东，但均无实力。余汉謀請調其旧部駐陝南的六十五軍李振部回粵，为胡宗南所阻。勉强建立两个軍的番号，兵数不足，装备不完，形同烏合之众。薛把保安团編成四个师，亦缺少装备，张发奎光杆一条，桂系原想拨苏祖馨的四十八軍給他指揮，苏軍未开到韶关，又撤走。蔣嫡系胡璉两軍，不听余指揮，他們所謂联桂抗蔣拒共的計劃悉成泡影。当解放軍进入粵境时，余薛两人率残余部队連同用苛捐重稅搜刮人民的財物，竄逃海南島，汇合陈济棠残部布防海南作最后掙扎。胡璉两軍除被消灭者外，由蔣派船載逃台湾。

桂軍自1949年9月在祁阳突围后，損失甚巨，逃回广西，白崇禧犹企图以广西为根据地，作垂死掙扎。派华中軍政副长官李品仙兼广西綏靖主任，同时由李出面排挤广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在广西开烟（鴉片烟）开賭，广筹餉源，下令成立民团，以广兵源。广西人民对桂系軍閥廿多年残酷統治，痛恨入骨，沒有一人愿当民团。民团建立不起。白所轄张淦、徐启明两个兵团及张光璋一个綏靖区司令，兵員不过十万人。以张淦兵团布防玉林，徐启明兵团和张光璋部布防南宁至欽县边界，周祖晃率保安团队布防桂林，白崇禧在柳州日夜准备飞机以便兵敗时逃走。

桂系旧軍政人員一部分已早期逃港，我亦其中之一，黃启汉（立法委員曾任白的秘书）于1949年10月下旬由北京到

香港为我们解释中共中央的政策，我和张任民(伪立法委员)联名写信给白崇禧劝他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亡羊补牢，尚未为晚，不应再苦广西人民。这信交给黄启汉带回广西交白。还有陈良佐、陈雄等亦有联名致白之信，内容大意相同。另又联名致信李宗仁，劝他领导川、滇、黔各省接受中共和平条款，这信交丘昌渭、程思远带往重庆呈李。白复信给我们狡诈地说，愿接受各人意见。李复信大骂各人叛降中共。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白指挥桂军抵抗，张淦兵团在玉林全部被歼灭，张淦及第七军长李本一被俘，徐启明兵团在南宁欽县边界亦全部被解决，徐只身逃亡，军、师长以下悉被俘虏，张光璋败退至百色全部投降。周祖晃在桂林兵败投降。白与李品仙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转逃台湾，夏威逃香港，黄旭初逃日本，殃民祸国廿余年的桂系军阀至此全部复灭。

当白崇禧兵败离开广西之前，还命令鍾祖培、莫树杰、周竞等率其残余，联合土匪不下数十万人，伏击解放军和革命干部。但不久莫树杰周竞等出降，鍾祖培冥顽不灵，终罹法网。广西解放后一年，白崇禧的残部及其所布置的土匪，悉为人民解放军消灭。

桂系军阀自1925年崛起广西，蹂躏十余省，荼毒千百万人，铁蹄所至，閭里为墟，广西和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计。自人民解放军进入广西后，人民才获重见天日。予书及此，不独痛恨桂系军阀殃民祸国的滔天罪恶，同时亦痛恨自己帮凶的罪恶也。

1962年8月